

袁同疇剛毅正直

宋承書

剛毅不屈反陳獨秀

袁同疇先生，字梧江，湖南省汝城縣人，民前十一年（西元一九〇〇年）一月五日出生。父先才公，幼穎悟異常人，入塾讀書，過目成誦；及長，質遷有成，資兼文武，惜屢試不第，乃捐資贈貢生。初娶朱太夫人，有惠德，早逝，育有二子一女；繼配邑中望族殿華村宋太夫人，生子同疇、正東，宋太夫人賢明有威儀，治家課子極嚴正。先才公歿時，同疇僅七歲，正東甫三齡，端賴宋太夫人撫孤督教，得以成立；而對嫡出子女愛憐備至，視同己出，尤為鄉黨所稱道。德配朱素心夫人，系出名門，伉儷情篤，相夫教子，持家有度；子國定，在美經商，頗有成就，為朋儕所稱羨。袁同疇先生早年在上海與陳獨秀、邵力子、沈玄廬等共組「社會主義青年團」，後因陳獨秀改組社團為「共產主義青年團」，袁與陳獨秀因意見不合而分道揚鑣；陳獨秀創「中國共產黨」，袁即成為反共之先鋒；並因共產黨徒誣賴黨國元勳戴季陶傳賢曾為共產黨發起人之一事，作嚴正之辨正，所撰文稿，字裡行間均表現剛

毅不屈之精神，讀其文，輒令人欽佩不已。

求學生活多姿多采

同疇先生方當就學之年，適科舉已廢，私塾停辦，新學校又未設立，無處讀書，幸族叔丹梯先生熱心勸學，集子弟而教導之；不久國民小學成立，丹梯先生仍以秀才資格任校長，所授課目，亦自舊三字經而國文、算術，間亦有體操唱歌等。

民國二年春，袁先生考進縣立第三高等小學，也就是由濂溪書院改辦新制的高等小學第一屆，同學只有七十二人，課程依教育部規定，有國文、修身、數學、歷史、地理，及理科、農業、美、音、體等，三年苦讀，受益匪淺。濂溪書院為宋儒理學泰斗周敦頤（濂溪）講學之所，周氏曾任郴州之桂陽令；「桂陽」於漢為「漢寧」縣地，東晉置「汝城」；宋，太平興國初，又改名曰「桂陽」縣，屬郴州；晉入民國後，因與桂陽州改縣後同名，乃恢復為「汝城」縣之舊稱。濂溪先生因治績特著，而政簡刑清；他完成他的學術思想體系，亦正在此時，史稱思、孟而後，他獨得

聖賢不傳之學；二程從游於前，關閩繼起於後，遞嬗發揚，蔚成儒家正統，而為我國文教主流，致汝城雖小，也是聖域與賢關；他去世後，邑人為紀念其恩澤，乃將其講學之所定名為「濂溪書院」，山明水秀，校舍整潔清幽，為全縣歷代優秀學子受業解惑之所。

袁先生自濂溪高小畢業之後，為奠定國學基礎，入「鵝湖書院」修讀一年，得其堂兄已酉拔貢丕承先生之誨導，每日上午教經史，尤重論語、孟子和左傳，要能讀、能解、能背；下午詩文，選讀古詩、唐詩，及唐、宋諸名家古文；每星期作文一次，評改有眉批、段批、總批，使師生之思想、觀念完全溝通；並詳告：「作文之道，在明義理；首要條理通順，次要文筆暢達，再次就要修辭雅馴……」又云：「讀書首要懂解，次要熟讀，書讀熟了，作文時會自動來湊合你，使你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汨汨而來，其樂無窮。」袁先生能深切領會，才有爾後在文事上的優秀表現。

以袁先生當時的家庭環境而言，是必須升學的，何況他的母親既知書明禮，又期望孩子們有

所成就；可是，那時本縣尚無中學，只有郴縣有一所由六縣聯合辦理的「郴郡聯合中學」，聯中有公費、私費兩種學生，公費由縣考取送學校，因為當時縣勸學所長（今教育局長）為同疇先生之堂兄，也就是同疇先生讀渙溪高小的校長，後轉任湖湘書院教師的袁丕承先生；為免嫌疑起見，把同村應考之同疇、周章、介白三位，摒諸二十名公費名額之外；幸入學就讀，期終考試之後，此三人均列五名之內，學校當局大為不平，行文汝城縣政府，硬把三人改為公費，使他們揚眉吐氣，討回公道。但一年級讀完後，因三年級人數太少，學校重新編班，把一年級較優學生，編在三年級；使同疇先生與堂兄周章不滿，恐跟不上；承教英文的文老師建議，便轉學去長沙，周章先生入獄，同疇先生進船山。

同疇先生在船山中學受益至鉅，曾撰「船山名師錄」以紀念之。其中對校長貝允昕先生之慈祥體恤，學問好，道德好，以湖南律師公會會長之身份，專為窮人打官司。繼任校長石廣權先生，是我國有數的國學大師，精研小學，對四書、五經以及諸子百家之書，莫不細讀深思，而有創見，著述不少，為士林所推重；於驅毒（指督軍張敬堯）運動罷課之際，特輔導同疇先生研讀中國哲學等書。第三位彭政樞先生，為國文老師，在前清為最有經驗之閱卷房師，故其所批之作文，仔細透徹，對同疇先生之作，給一百分外，再加二十分，致同疇先生有「一百二十分」之別名。因學校被迫復課，袁先生以學聯會校代表之身份，憤而離校，未參加畢業考試；但因他平日品

學兼優，學校仍以平日成績平均後，給予文憑。

當袁先生準備坐船赴上海之時，船山同學對其領導學聯會之卓越表現，至為敬佩；故至碼頭送行者，達七八十人之衆。袁抵上海不久，所帶家中方寄來之大洋百元將用罄，恐無以為繼，乃撰稿投「民國日報」與「時事新報」，幸獲刊登，月獲稿費四五十元，足以維生。在長沙的同學們，見其能在上海立足，亦紛紛前來，有吳芳、卜士崎（後改名卜道明，曾任我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）、李若虛、何驥、袁介白等；以工作互異，能力不同，非用互助方式，不能共度難關，經研商結果，決組「滬濱工讀互助團」；試行社會主義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之理想，並發表宣言，要求社會支持，各報章亦為之傳播，轟動一時，咸認為解決青年求學之新途徑。成立之日，得上海名流蒞臨指導者，有邵力子、沈玄廬、李石岑、聶鴻生、黃警頑諸先生；未到而來信表示同情者，有張東蓀、陳獨秀等。

袁先生因得邵力子、李石岑、黃警頑各前輩之愛護與賞識，各以其在復旦大學授課之便，特向復旦校長李登輝老先生推薦袁先生，謂其大學課程已修不少，可以插班深造；李校長以邵等所介紹者，想亦非汎汎之輩，欣然接受；同疇先生兩後則白天至學校上課，晚上到報館幫忙，以至修畢學分畢業而後已。

前往南洋教學辦報

復旦畢業之後，何去何從？成為袁先生苦惱之事；他說：「此時我的思想已經定型；我愛好

民主、自由，而反對極權專政！」所以，「外國語學社」，專門負責俄文教授，並主持「中俄通訊社」的山東人楊明齋，曾多次勸他去俄國，他都謝絕了！他很想去美國，可惜沒有機會；他覺得美國對外雖也有帝國主義的色彩，但其國內是民主、自由；俄既不想去，美又無機會；適在「小說月報」讀許地山先生的「商人婦」，所描寫的南洋風土人情，有引人入勝之處，使袁先生心動，有前往看看的興趣；請教邵力子先生，邵先生很贊同，約聘為報館之特約記者，並贈旅資大洋八十元。自上海坐船至廣州，再轉新加坡，旅費僅剩港幣九毫了，急忙索閱華文報，隨即寫了兩篇稿子投去，果然刊登，報館主筆並來採訪，更以住旅社太貴，介紹至華僑教育委員會，承負責人梁先生之招待住宿；繼為介紹北婆羅洲納閣去當校長；月餘後，積了些稿費，擬作北婆羅洲之遊，目的是山打根，企由該地去菲律賓，轉美國。船經納閣時，須上下貨停半日，便步至華僑小學一訪；迎面見一校工，問校長在否？告以「本來請了一位袁校長，很久沒有來，現由一位唐先生（空）代理校長。」袁見既有人代理，何必搶人飯碗，且亦不想在小島久待，乃以別人名片見唐校長；兩人一見投機，竟承留住兩天，繼介紹至一風景宜人、椰子園住宿，寫了不少東西；後又承介紹至北婆羅洲首府亞庇華校任教，與老友白瑜相遇，相見有如夢境；愉快過了幾月，知由山打根赴菲轉美不可能，便決定赴仰慕已久的檳榔嶼（即檳城）去看看。在檳城大病一場，頭髮都已掉光；次年春，唐校長亦調馬來士莪月新

民學校，聞袁大病，接去休養進補；療後除寫寫稿外，也教教課，深受學生及家長之敬愛，校董謝竹筠先生，更親如家人，有正義感，愛國家，愛民族，深不以英國人的帝國主義作風為然。

此時，中國共產黨為擴充其勢力，派了大批人員到南洋，假借國共合作關係，攫取各埠華文報紙，以散布其荒謬言論，提倡階級鬥爭；謂只有階級敵人，沒有民族敵人；而當時英國的殖民政府，歧視有色人種，對我們華僑，尤極盡壓榨之能事：言論受限制、教育受限制、經濟受剝削。「所以，我們主張華僑要團結起來！反抗帝國主義；我們要求民族解放，然後求個體解放；與共產黨階級鬥爭，分化內部的主張，剛剛相反；經過多次辯論，以後我們的稿子常常登不出來；謝竹筠先生和許多僑領，深為不平，就主張我辦一刊物，以相抗衡。」於是，「南洋評論」就在吉隆坡誕生了！

「南洋評論」由袁先生主筆政，友好白瑜、董叔和、李兼越、周維新等助其陣；經理方面，全由唐空校長負責；此一反共、抗帝而又有新思想的刊物發行之後，一時洛陽紙貴，搶購一空，接連出了幾期，蔚成反共愛國的巨流。袁先生說：「那時國父的三民主義還沒有出版，我們無所秉承，只是憑良知說實話而已！」影響所及，華裔青年更加擁護，希望該社辦一學校，收容他們讀書；於是在「南洋評論」附近租一大樓，開辦「南溟學館」，主修國學兼教英數，因為都是一些有志青年，後來回國升學，皆各有成就。因其發展，對共產黨在南洋的工作，有莫大之影響。

；吉隆坡國民黨所辦，但被共黨分子掌握的「益羣報」，就向英國殖民政府告了袁先生一狀，說他們是「過激派」。

英殖民政府據此即驅袁出境，袁離馬來半島後，好在各埠當時還是自由港，來去都方便；先到山打根，以寫作讀書消遣；幾月之後，接吉隆坡來信，因不准登載袁先生的稿件，致「南洋評論」銷售銳減，廣告也無，無法維持；黎忠烈與唐空二位負責人，急催袁先生回檳挽救；袁回檳城，又被英方監視，限一週內離境；是時，社方為長遠計，共籌至新加坡設一印刷所，並由袁去籌辦，方抵星，多時未見之船山同學韓竹痕又出現，此人於同聯先生初來南洋時，曾奉陳獨秀之命，來向袁先生游說，此時又舊調重談：要袁先生和共黨合作，至少不要反共，要不然就會有麻煩。袁答以「信仰是不能勉強的！不過大家都是中國人，最好不要落井下石！」因之，共黨乃借刀殺人，偽造了很多煽動暴亂文件及書信，都有袁同聯姓名在內，並密報華民政務司指定地點查扣；英人愚昧，信以為真；乃查封「南洋評論」，解散「南溟學館」，並繫袁先生入獄……月餘之後，為僑領們報經廖仲愷先生，轉請國父營救，英方方釋放袁先生，押經香港，監遣廣州。袁先生離星前曾上書英總督，應善待華僑，多注意日本間諜，否則將自食其果。以後回憶說：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日軍佔領新加坡，果然把許多英國人，關進這座大監獄裏；並要一些英國人，在街上拉人力車，載著東方人兜圈子，果然自食其果；日本人從來不大做好事，這件事總算做得不錯！」可見其對英國殖民政府之不滿，對英國殖民官僚之痛恨！

服務軍校受知領袖

袁先生被遣回廣州之後，便去惠州會館（當時的中央黨部）拜謁廖仲愷先生，面致謝忱，廖熱忱接待，並欲介紹袁入黨，袁要請教戴季陶先生後再決定；待戴自滬返穗之後，同住廖府，談了一些問題，戴介紹袁去軍校工作，當即答應；於十三年五月廿八日到軍校，當時還在籌備時期；蔣介石任籌備委員長兼校長，廖先生為黨代表，戴先生當政治部主任；政治部和黨在一起辦公，袁因係廖、戴二位元勳介紹入黨的，專辦黨務，任書記，又被推為特種黨部常委，曾代表軍校向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作黨務報告，講詞列於校長蔣公軍事報告之後，成為歷史文獻；復因周恩來來了，改組政治部和黨部，袁受排擠，校長乃將之調為辦公廳秘書，負責整理演講詞等事，並兼校史編纂委員會總編纂；隨軍北伐光復武漢後，因操勞過度，神經衰弱，無法安眠；當時國內醫療水準尚差，乃赴日本就醫，並入日本大學修習政治、經濟等。年餘，北伐軍克復南京，奉總司令蔣公電召回國；以湖南之清黨工作重要，囑其回湖南擔任省黨部委員，負責清黨工作及兼感化院院長等；繼因共黨蔓延湘、粵、贛，又奉命擔任邊境討逆民團總指揮官。抗日戰起，因與陳辭修（誠）在黃埔有同事之誼，應邀為其臂助，自二十七年三月起，至三十五年七月止，均參與陳將軍之幕府；擔任軍事委員會政

治部設計委員，第六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中將委員兼秘書長等；勝利後，擔任中央訓練團甄訓考核組長及國防部中將文職司司長；前者負責訓練並考核，分發退除役軍官，轉入文職部門工作；後者負責審定軍事機構文職人員的員額和資格；身體並不硬朗的袁先生，却肩負二者之間的橋樑，其沉重可知，因為那時正當勝利復員之後。有十幾萬退除役軍官需要轉業；總算順利完成，因其懋績不著，迭蒙勳獎。

與癌症搏鬥近廿年

民國六十二年，袁先生在「中外雜誌」發表了一篇二萬餘字的「我戰勝了癌症」一文，對其與「癌」搏鬥了二十餘年（至去世時為三十餘年）的經過，報導翔實；使讀者無不共掬同情之淚。

可能即因辦理退除役軍官工作之忙碌，使其民國十一年在檳城所害之傷寒，在軍校所致之神經衰弱之影響，經不起勞累，經常有頭痛、鼻塞、舌頭說話不聽指揮等情事，至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深夜，鼻孔大量流血，流得滿床滿地，痰盂、面盆都是血，真是一場大血戰；後赴上海紅十字醫院檢查，斷定是患變型細胞鼻咽癌（Squamous Cell-Carcinoma），囑應速赴上海鑄錠治療院（RADIUMINSTITUTE）簡稱鑄錠醫院）求治。鑄錠醫院為比利時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，規模並不太大，但庭院寬敞，院內十幾畝地上，樹木花草繁茂幽森，房舍設備精美，布置豪華，而其醫療用的鑄錠，全世界只有十四

個半克朗田（Gram），這裏就有兩個半，堪稱東南亞擁有鑄錠最多的一家醫院。院長是一位留法、留英，並在英國擔任放射治療多年的中國醫生吳桓興博士；袁同峙先生說：「吳博士對放射治療，既有深遠的研究和豐富的經驗；對於病患，尤其熱忱，親切負責；使人如沐春風，真是一位術德兼修的好醫生。」

袁先生自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入上海鑄錠醫院治療後，除短期不計外，前後住院三次：第一次：自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五日起，至三十六年一月十七日止，共住了四十三日；照深部X光六十三次，上鑄錠兩次。第二次：自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起，至六月二十日止，住了二十二日，照深部X光二十次，上鑄錠一次。第三次：自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起，至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止，住了三十五天，照深部X光十七次，未上鑄錠；總計三次住院一百天，共照深部X光一百次，上鑄錠三次。

住如此長久的醫院的頭等病房，加上當時所照之X光及上鑄錠的價錢又不低，以當時袁先生所得之中將待遇，一月的收入，也不足三天的帳單；袁先生說：「幸虧老友聯勤總部軍醫署長陳立楷兄、衛勤司副司長毛懋猷兄，都有愛人如己病家為懷的精神，盡力替我想辦法，終獲層峰的許可；所有醫藥費用，由公家實報實銷。」

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初到時體重五十六公斤，後增至六十公斤，幾已回復病前原狀（初入鑄錠醫院時，體重已自六十五公斤降至四十五公斤）；後因鼻塞請某公立醫院醫師治療，經輕率動

刀切片後，致發炎腐臭，至五十二年三月，又大量流血，幸經三總耳鼻喉科主任方良金醫師之細心治療，稍癒；鼻腔內分泌物少了，肌肉也收縮了，漸漸露出一點骨頭來，再過幾天，骨頭脫落了，橫梗在鼻中膈內，不能出來，非動手術不可；九月四日入住郵政醫院，由方主任親自用剪刀把這塊骨頭剪斷，分成兩塊，從鼻孔取出，共有一英寸半長，是死骨；死骨取出後，頓覺輕鬆了。

至民國五十五年六月間，袁先生因感冒，喉頭發癢，擬赴門診中心請方主任診治，適請假，由另一位醫師代看，他既不問以前害過什麼病？也沒檢查口腔，急急忙忙在袁先生喉頭塗了一點藥；第二天，就發覺下右舌軟顎有一小洞，說話的聲音也不對了，這洞由芝麻小，變成黃豆大，再變成蠶豆大，最後成為缺口而殘廢了！因之飲食更易進入鼻腔；吃飯非特別小心緩慢不可，否則，就會大量擠入鼻腔，由鼻孔流出；好像麵條一樣，一邊進，一邊出，不但難看，而且難受；不得不以鹽水沖洗，沖洗多了，又沖破鼻膜流血；至五十五年十一月九日，又像前面所說之大流血一般，請醫生打針也止不住，急送臺灣療養院，經院長親自急救，方保全了性命。

幾年之後，又患了氣喘病，不能躺下睡覺，後至美國擬補治軟顎之空洞，因美國氣候乾爽，氣喘不治而癒；補軟顎之手術，醫生認為無把握，也就只好回國了。

回鄉競選戰勝土豪

民國三十六年十月間，中央提名袁同疇先生爲湖南省汝城縣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。

袁先生於十一月十一日自南京啓程，經漢口，過長沙，轉由樂昌至縣內，助理人員以對手爲一土豪，因販賣鴉片，賺了不少錢，把選票都買去了，頭寸不夠，就以穀五斗（等於四十斤白米）買票一張；袁先生等研究之後，不能以「受賄者法辦」嚇唬選民，免其反感；而以「人家受賄不受賄，我們不管，只要憑良心投票就好了！如果因爲受了某人的賄，就投某人的票，我們一定要檢舉，一定法辦。」連夜分往各鄉宣傳；從此「受賄了受賄，投票了投票！」這個土豪的錢都白花了，聽說所花在法幣十五億之數，也可以說其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開票結果，袁先生以高票當選國大代表。

他在國民代表大會集會時，不發言則已，所言皆就事論事，言之有物；又以國大代表身份，爲當年「聯合國問題」，上書政要如當時行政院蔣副院長經國先生、秘書長黃少谷先生、中國國民黨張寶樹秘書長等，所言中肯有見地，皆得回函表謝意；又爲中美邦交問題，紛致美國政要談道義與利害；對臺灣份子之活動，曾致美國國會各議員專函，希望勿讓陰謀不滿分子，披上人權或民主的外衣，肆行擾亂社會，從事顛覆政府的活動。憂時愛國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國營事業主持有方

袁先生到臺灣第一件任務，就是代表國防部接收日本賠償物資；上面規定可設辦事處，每月

經費預算新臺幣二萬四千元，以當時幣值言，少校月薪僅百元左右，他可以分設科、組，用上二三十人以上，亦理所當然；可是，他只用了筆者四弟宋承魁（爾後歷任土地銀行總行主計、人事主管，後調分行經理）及一助理，給承魁中尉待遇，助理爲准尉，合文具郵資等，每月所費不到一千元，剩下的二萬三千餘元，要舍弟每月退還國防部；使國防部經管預算者，除對袁先生敬佩萬分外，爲處理所退之款，亦大傷腦筋；都說，如果人人都像袁先生一樣，那裏會有貪污舞弊營私等不法情事發生？國家那有不富強之理？

該辦事處接收之物資，大部分用作補充國防軍事公用生產設備的機械，由生產管理委員會統一調配運輸；是時經濟部之負責代表，便是後來兩任經濟部長，對臺灣經濟發展貢獻最大的尹仲容先生，他們配合非常密切，其接收及分配之程序爲：將日本賠償之機械設備等，列冊公布給有關生產單位，由有關單位以本身之條件，可用得上的種類與數量，向生管會申請；生管會審核符合之後，由日本運來物資時，即直接送交申請單位之廠場查收，無須經生管會核轉運，以免延誤；但如申請單位未按預定時間裝設使用時，生管會即將是項物資另撥次一需要申請單位，以免閒置；當時大批機械對臺灣軍公工業之發展，有極大的功績；故尹仲容先生去世時，筆者適率家人自南部至袁府過新年，袁先生哭得兩眼紅腫，頻稱：「尹先生早逝，是國家最大的損失！是國家最大的損失！」

袁先生任臺糖公司常務監察人、董事，其貢

獻亦大；他剛就職不久之後，赴南部各廠巡察，輕車簡從，忙碌時，間或約筆者協助整理文件及表報；筆者偶詢其與當今層峯之關係，何以屈就這麼一個閒差事？他無意中說：「陳辭修（誠）將軍初任行政院長時，曾擬報任他爲內政部部長，他知道之後，以病體不堪負荷懇辭；但又不能閒着，故找個這麼閒差事幹幹。因其對臺糖的營運及財務狀況，曾下工夫仔細研究，對其利弊得失，精打細算，分析甚詳；所作興革建議，均由臺糖當局作爲改進依據；深爲臺糖董事長楊繼曾氏所倚重；故楊氏出長經濟部後，因見中國漁業公司經營困難，乃借重其長才，請其出長中漁公司；就任年餘，大事改革，使該公司業務漸有起色；惜因增資願望未達成，中日漁業合作因日本節外生枝（要求賠償大陸淪陷前所遺失之十餘艘漁船，真是豈有此理！），進展緩慢；且適經濟部改組，乃堅決辭卸中漁董事長之職。」

爲戴傳賢被誣辯正

五十年代之後期，史學家依據中國共產黨之史籍，引述周佛海、陳公博等之所記，或張國燾與包惠僧之追述；謂戴國元勳戴季陶先生曾參加爲「共產黨」之發起人，並爲草擬黨綱；後因與孫中山先生之關係過於密切，不得不退出發起人一事。

袁先生承「增訂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」作者陳伯稼之請教，問袁先生對此事之看法如何？袁先生當即回答：「這是一個誤會，一個天大的誤會！」因陳伯稼年高重聽，袁先生即寫了一篇書

面意見送陳伯稼；後來刊入戴傳賢的編年傳記裏面，略資辨正；更依其內容，撰寫「一個應應辯正的史實」等文，公諸社會，以正視聽。

袁先生之說明略謂：「民國九年，我由長沙船山中學至上海後，因家中寄供大洋一百元即將用罄，恐生活無着，乃撰文投『民國日報』及『時事新聞』二報，投稿均獲刊登，月得稿費四五十元，足以維生；長沙同學見其可在上海立足，吳芳、卜士疇（即以後國際問題研究所長卜道明）、李若虛、何驥、袁介白等亦至，互組『滬濱工讀互助團』；陳獨秀是有意把理想付諸行動的野心者，故對青年之拉攏，全力以赴；見我袁某在文事上有號召，組織工作上亦有潛力，乃專誠拜訪，往來既多，仰慕亦增；共議籌組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（即SY），除陳與我之外，以工讀互助團同學為骨幹，嗣在上海老魚陽里二號陳獨秀家舉行第一次會議，還有邵力子、沈玄廬、陳望道、李達、俞秀松等參加；社會主義青年團原以研究各種社會主義為主，故大家樂於參加。」

後來袁先生為什麼與陳獨秀分手了呢？同噲先生說：「有一次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國外經學社（該團對外所掛的招牌，由山東人楊明齋主持，楊並辦有中俄通訊社，傳播赤化新聞。）開會，為了一件小事，我與陳獨秀爭論得很厲害；就是因為沈雁冰（即茅盾）譯了一部書，賣給商務印書館，得稿酬八十元，他捐贈外國語學社購買參考書；我主張各種社會主義參考書，只要有賣的，都可以買；陳獨秀堅決反對，他說：『只有共產主義，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，如果把其他的書買來，反而把大家思想擾亂了！』我說：『如果不把各種社會主義加以研究比較，又怎能知道那個好？那個壞呢？要大家盲從，是不行的！』因此一逼，陳獨秀就宣布停止討論，要我夜間到他家裏再談。是夜我到他家裏，他就乾脆告訴我：他已決定把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，改組為『共產主義青年團』，問我與我的同學贊成與否？如不贊成，就各作各的了。從此，我退出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，而陳獨秀就把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，改組為『共產主義青年團』（即CY），後來又正式改為『共產黨』；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時期，辦的刊物名叫『勞動介』，由我主編；後來共產黨辦的刊物名叫『嚮導』，兩者言論主張，截然不同。這些事，當時都是秘密，所以外間很難弄得清楚。」

袁先生以現身說法，所以對戴先生是否因曾參加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，而被誤會曾參加『共產黨』？認為很有可能，袁先生說：「我想，這是一個誤會，這個誤會可能是這樣的：民國九年，陳獨秀在上海曾以廣義的社會主義相號召，籌組社會主義青年團，因為戴先生是全國知名的學者，而且對社會主義有研究，對勞工問題也注意；陳獨秀很自然的會和他交往，爭取他的支持；戴先生也許對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，參加了一點意見，或竟同意贊助；不過他的思想比較穩健，且不願意背棄本國傳統文化，這一點和陳獨秀有很大的距離；所以，他的態度還是很保留的，在任何集會中，都沒有他的踪跡；周、陳兩人所說的，或即指此一段關係而言；至於後來的共產黨，和他的主題根本冰炭不相容，他反對惟恐不及，還談得上參加或贊助嗎？」

談到周佛海與陳公博兩人，袁先生說：「這兩個人都無聊、無恥的投機份子；時而共產黨，時而國民黨，最後竟以漢奸下場；他們說話，原不可靠，且極矛盾！」最後下結論說：「總而言之，共產黨雖是由社會主義青年團、共產主義青年團演變而來的；但是，前後的主張各異，參加的人員也不盡相同，不能視為一體！譬如某甲生了幾個兒子，又生了幾個孫子，他的兒子、孫子固然是由某甲而來；但不能說他的兒子、孫子就是某甲。所以，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是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，『共產黨』是『共產黨』；如果把『共產黨』當作『社會主義青年團』，就無異把某甲的兒子、孫子當作某甲一樣的錯誤！這是我所見的史實，可是知道的人很少，我有生之日，不可不予辯正！」

附記：袁同噲先生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一日上午，離府赴三軍總醫院就診前，尚交管家一信寄筆者，是最後的一次筆跡；是日因三總無床位，又回寓；次日赴榮總，當即住院，至十三日傍晚，因眼藥噎住咽喉，即已昏迷不省人事，至二十日宣布逝世；葬臺北市內湖國軍將士示範公墓。袁先生一生淡泊名利，清廉自守，剛毅正直，頗為士林所推重；其遇新舊思想交替之際，不為邪說所惑；所以立場公正，辯正史實，也稱得上是歷史性的人物；筆者身為表弟，對其明是非，別邪正，至為欽敬！故於課餘之暇，爰撰此文，以為紀念。